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13位ISBN编号：9787806815007

10位ISBN编号：7806815007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盛巽昌

页数：4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大量的文化成就从这里诞生，无数的优秀人才从这里走向社会。

本书所描述的文化名人与图书馆的情缘，虽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感人肺腑的业绩，正确认识图书馆在社会进步中和个人成长中的巨大作用，我们特借本书推出“助读活动”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书内容框架。

正文介绍某位名人与图书馆的关系：“链接”提供与此相关的背景资料；“余思”则帮助作者进一步思考。

阅读时可将三者融会贯通，加深理解。

二、篇后“余思”题型。

考虑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实际情况，我们本着重在参与的原则，设计了三类知识难度、答题方式各不相同的题目，其类型分别是：1、知识问答题，题后一*标出。

难易程度不一、可按需采用。

2、简述题。

3、心得体会及学术短论。

三、活动办法提示。

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社区，如有意利用本书开展读书活动，我们竭诚欢迎前来咨询、联系，出版社除按优惠价格提供本书外，还将根据需要在书中制作有关单位的活动内容介绍；此外，还将按活动开展的规模、质量等具体情况无偿提供本社的部分图书作为奖品。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书籍目录

前言：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延伸轨迹的时空组合 陈燮君康有为：创造性地建立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书藏” 缪荃孙：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王国维：西学东渐和旧文化回归 唐文治：由旧学跨进新学殿堂 梁启超：有全方位成就的图书馆馆长 张元济：永远在一个坐标轴上的出版企业家和图书馆学者 孙毓修：从儿童文学“开山祖师”到涵芬楼版本学者 冒鹤亭：一代词家的藏书思维 孙中山：手不释卷、无不博览的表率 蔡元培：为图书馆奔走的学界泰斗 鲁迅：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首批耕耘者 陆费逵：出版家的图书馆构建 张宗祥：一生抄书六十卷 李大钊：承前启后，建设现代图书馆 胡适：科学的考据就得下功夫 王云五：取名东方图书馆，表示与西方并驾齐驱 恽代英：学识不出于学校而出于图书馆 冯玉祥：每天几乎都在看书用书 柳诒徵：直接培育人才的图书馆模式 王献唐：金石图书本一家 黄炎培：“非有斋”主人的文化思维 洪业：编制有永恒价值的经史子集引得 陶行知：“书呆子莫来馆”的创建者 杜定友：中国图书馆史五个第一的创造者 刘国钧：多才多艺的图书分类法专家 姚石子：藏书家的角色转换 顾颉刚：历史学家的文献意识和实践 陈寅恪：读常见书，写非常文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是这样诞生的 许地山：在家靠图书馆开拓，出家要开拓图书馆 郭沫若：优良的图书馆，有时会超过学校教育 冯友兰：哲学史大家也管理过图书馆 报纸 吉鸿昌：将军十万里行程的考察 谭其骧：终身难忘的图书馆员 三年 丁福保：“收藏书的目的，是捐给公众阅读的图书馆” 李公朴：读书不要倾斜 文学书籍 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 林语堂：擅长作索引的作家 曹聚仁：把图书馆全景写进故事的第一人 王重民：海外寻书十四年 姜亮夫：行万里路，读遍欧洲所藏敦煌文献 向达：走向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文化轨迹 吴晗：“太史公”在图书馆 彭雪枫：战地图书馆戎马生涯 陈垣：自目录学寻史源，从校勘学找史实 郁达夫：择居贴近图书馆 余嘉锡：教书，著书，一生都和书打交道 傅斯年：一流的大学，必有一流的图书馆 蒋复璁：六十年图书馆生涯成仿吾：革命根据地学校要有图书馆 后记：20世纪图书馆和中华学人坐标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章节摘录

鲁迅：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首批耕耘者 作为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
也是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开拓者。

1912年3月，鲁迅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负责社会教育工作。
当时教育部社会教育的一项主要任务。

就是筹建中央图书馆。

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鲁迅于同年5月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该科业务包括领导、管理全国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调查和搜集各种文物，所以实际上是国家直接管理全国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机构。

从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止，他整整工作了14年。

鲁迅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对北京市的图书馆建设，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

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共有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各个方面。

国家图书馆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鲁迅参与当年该馆建设的珍贵文献。

奔波操劳，奠定京城图书馆基石 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

1912年7月，馆长江瀚向主管部门教育部呈报“京师图书馆暂定阅览章程十八条”，它由已任教育部佥事、主管图书馆工作的鲁迅签发。

这也是我国第一份由中央政府部门正式批准颁布的具体的图书馆法规。

1913年2月，江瀚调任他职，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第一科科长鲁迅负责主管图书馆，由此他经常前往京师图书馆处理各种事务。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连绵，鲁迅在日记中写有“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

然而鲁迅于“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途中冷甚。

晚食山药作饭”。

鲁迅重视大众教育，到教育部后不久就参加了通俗教育会。

主管图书馆后，为了让这一具有独特社会教育功能的机构广泛地面向普通百姓，他开始筹办京师图书馆分馆和通俗图书馆。

1913年4月1日，他同教育部同仁一起查看前青厂图书分馆，此时离他正式接手京师图书馆只有十多天，1913年10月21日通俗图书馆又在宣武门内大街宣告成立。

由于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认为青年总要超过老年，因此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通俗图书馆的建设就体现了鲁迅的这一思想。

该馆的藏书分普通书和儿童用书两部分，还附设一个儿童体育场，它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图书馆。

通俗图书馆后与图书分馆合并，就是今天首都图书馆的前身。

1913年10月，因为京师图书馆所处的广化寺过于偏僻，交通不便，读者寥寥，教育部决定将其暂时关闭，委派鲁迅负责清理和改组搬迁工作。

为了搞好改组搬迁，鲁迅想方设法，绞尽脑汁。

他在日记中写有，“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

在国家图书馆的档案里还保留着鲁迅当年指导搬迁的文献，他要求馆员把所有藏书都“分别部类，编列号数，刊印表签，逐册粘贴，依序陈列，以便收发检查”。

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馆址，鲁迅曾计划把故宫的端门、午门一带建成文博区，设想把京师图书馆建在午门楼上，而在端门上设置历史博物馆。

然而，由于被推翻的清朝小皇帝溥仪仍占据着故宫。

端门、午门是故宫的门户，所以鲁迅的设想未能实现。

京师图书馆最后设在清国子监南学旧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开幕，鲁迅前往参加，并与其他来宾合影留念。

这张照片今天仍然珍藏在国家图书馆。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是鲁迅创建的又一所图书馆。

1916年9月，教育部在给内务部的咨文中提到，计划在中央公园(今工人文化宫)内设置图书馆和教育博物馆，准备“购置通俗图书，并陈设教育上简易物品，专备游人观览。

”这件工作具体就由鲁迅负责。

经过一年的筹建，1917年8月21日中央公园的图书室对外开放，山1：公园游人众多，阅览读者一直非常拥挤。

鲁迅打算将图书阅览所扩人为图书馆，为此在1919年9月22日他专门同三名部员“往市政公所议公园中图书馆事”。

遗憾的是，鲁迅的计则没有能够实现，否则，北京将又会多一座环境极佳的图书馆。

想方设法 充实图书馆藏书 鲁迅对藏书搜集相当重视，不断借助行政手段向有关部门调拨图书充实馆藏。

1912年他以教育部名义为京师图书馆征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

1913年9月又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调拨给京师图书馆。

1916年10月以教育部名义咨文全国，征集各地的地方志和各种著名的碑碣石刻。

最让人称道的是，鲁迅据理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类书。

正本约于明亡之际被毁，副本在清咸丰朝后逐渐散失。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副本大部遭焚毁，未焚的也几乎全被劫走。

残本在京师图书馆筹建时已决定移交该馆保管，但一直没有办理。

辛亥革命后，残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清末状元陆润庠浑水摸鱼搬回了家。

经过鲁迅以教育部的名义一再催讨，陆才于1913年?月将其交还给京师图书馆。

《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更为曲折。

清政府在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该馆收藏，但一直没有办理。

鲁迅到教育部后即与当时主管承德地区的热河都统联系催办。

1914年1月6日，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然而却被内务部拦截而去。

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在1916年7月12日使文津阁《四库全书》由内务部发还，全部入藏京师图书馆。

为了使京师图书馆具有较稳固的书源，鲁迅借鉴国外经验，大力推动我国出版物呈交本度的建立

。1916年4月，鲁迅在取得政事堂通过，内务部同意后，以教育部名义发布通令，要求凡在内务部立案出版发行的图书，都要呈交一本给京师图书馆。

为了促使这项制度更有效地实施，次年3月，鲁迅以教育部的名义咨文内务部，要求内务部也发布正式文件。

同年4月，内务部正式通令京内外的书局，务必认真执行教育部的文告。

从此，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呈交本制度正式成立。

鲁迅还向许多图书馆赠送自己的著作和各种图书。

京师图书馆、图书分馆、通俗图书馆及故乡绍兴的剡中图书馆等，都先后受到过他的馈赠。

赠送的图书有辑录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逸文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文字专著《小学问答》、介绍西方美术的《炭画》等。

鲁迅还多次向京师图书馆分馆和通俗图书馆赠送《新青年》。

身传言教宣传图书馆功能 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鲁迅积极对外宣传介绍，想方设法扩大图书馆的影响。

蒋抑卮是鲁迅的同乡好友、留日同学，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时曾得到蒋的鼎力资助。

小说出版后，又在蒋家开的上海广昌隆绸庄设立国内总经售处，并由蒋通过浙江图书馆分赠社会名流和各方学者，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

蒋抑卮对古迹兴趣浓厚，鲁迅专门写信向他介绍图书馆收藏的珍贵秘籍。

此外，鲁迅还多次向友人(包括一些外国友人)讲解如何利用图书馆，介绍通俗图书馆新版书大致齐备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借阅便利的情况，引导他们前往借阅。

鲁迅一辈子与书为伴，在利用图书馆方面为世人后学做出了表率。

蔡元培回忆道：在南京时，鲁迅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办公之暇，抄录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小说史。

为了收集史料，鲁迅经常出入图书馆。

十多年后他回忆当时收集史料的情景时写道：“时方闲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色喜。

”收集的艰辛，获得的喜悦，跃然纸上。

1928年夏，鲁迅携许广平到杭州旅行，不知情者以为他去度蜜月，而实际上他一连7天都泡在浙江图忆馆，为的是研究该馆收藏的《四库全书》。

鲁迅的最后10年居住在上海。

他曾经计划编撰一部中国文学史稿长编和中国字体变迁史。

对此他很自信，认为能够写出一些别人没有的新观点。

然而，清末民初，我国不少省都建立了有规模的图书馆，但上海却迟迟至二三十年代仍缺乏一家中心的巾级图书馆，以致当时的上海却没有可供鲁迅利用的图书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

剪取欤？无此许多事；赴图书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

”（《致曹聚仁》）从而使鲁迅的两部著作没有诞生。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憾事。

刘国钧：多才多艺的图书分类法专家 刘国钧(1899—1980)字衡如，一生从事中国图书馆事业。

他所不断改革、完善的图书分类法，在中国被普遍推广和应用。

任何著录卡片’的正确与否，都逃不过他的目光 刘国钧生于南京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父亲是个举人。

他自幼身材瘦小，沉默寡言，学习用功，成绩很好。

后考入金陵大学，进入当时最时髦的哲学系。

由于家中经济困难，课余到学校图书馆帮忙。

久而久之发现了我国图书馆的许多弊病，于是加修图书馆学作副科。

1920年毕业留校图书馆工作、发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等文章，介绍美国图书馆的方针、特点以及近代图书馆的情况。

1922年，刘国钧赴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研究院研究哲学和图书馆学，三年后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他利用余暇考察了美国图书馆的现状，写成《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等文章。

1925年，刘国钧回国，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

他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用了近五年时间，编出了《中国图书编目条例》。

从我国图书馆工作的实际出发，既继承了我国古代图书著录的通则，又吸收了西方目录学的成果。

它经过金陵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的反复试用，在草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这是当时我国图书编目最新最好的定本，包括以书名为标目的编目方法。

刘国钧在南京任职期间，常利用寒暑假到北平诸校进行图书馆业务辅导，南来北往，那时的火车运行非常缓慢，准点也得两日两夜，且时常误时，但他却视为乐事，还把嘈杂的车厢当作书室，旁若无人的读书、备课。

他还在北海图书馆兼任编纂部主任、主要指导编目工 作。

长期的治学严谨、认真，致使他能一目了然，发现他人的误区。

据说，任何著录卡片在他眼前一晃，就能发现卡片著录有否毛病，那怕著录不规范只差一格。

他定下的编目条例不仅在北平扎下厂根，还影响到了全国很多图书馆。

刘国钧热衷参加图书馆界的社会学术活动。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出版委员会主任，主编《图书馆学季刊》。

《图书馆学季刊》是当时中国最具有权威的图书馆学术刊物，老一辈的图书馆学者如袁同礼、傅振伦、赵万里都有著述论文；它也详细介绍了图书馆前驱者的事绩，如杨守敬、卢木斋、梁启超。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抗战爆发后，刘国钧随金陵大学迁往成都。

后来正在筹建中的西北图书馆，需要一位能执牛耳的图书馆学者筹划和主持。

刘国钧也自是最佳人选。

1943年他自愿到了兰州，担任图书馆筹备主任，次年开馆，出任馆长。

1949年8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威胁他去台湾，他作了一生中重要的抉择，留了下来。

兰州解放，担任兰州人民图书馆副馆长。

进北京后，他先后担任《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学译丛》编委，兼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和顾问。

参考《苏联书史》，写出《中国书史简编》 刘国钧从1925年在金陵大学任教授始，在55年生涯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

而主要就在图书馆学领域。

195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只有一个目录学教研室。

同年8月，刘国钧到北大后建立了图书馆学教研室，成为王重民系主任的得力助手，并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此后又陆续创立了图书分类、图书馆目录、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概论、外国图书馆分类法介绍等课程。

他因讲课清晰、有条理，深受学生的欢迎。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延伸轨迹的时空组合 20世纪的图书馆，养育和滋润了几代文化名人。

文化名人把图书馆视为知识的港湾，文化的载体，文明的殿堂，信息的集散地。

文化名人与图书馆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相遇，其延伸轨迹出现了动态的时空组合。

于是，思考了实践，梳理了思绪，凝聚了理论，激活了学术，把思想的放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整合，融进了新的时空组合。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受到19世纪末叶戊戌变法运动的影响，得到辛亥革命的激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经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体化的巨变，接受了科学革命、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和数字化文明的洗礼，挟裹世风，蕴含曲折，终究坚挺绵延，与时俱进。

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开明的维新派人士请求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

一些藏书楼演变成为初期的公共图书馆。

1902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筹建了古越藏书楼，两年以后正式开放。

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也先后建立。

1910年开始筹建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开放。

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比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更早一些。

1894年建立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902年则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势较强，据统计，1930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2935所，到1936年达5196所。

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藏书50余万册。

这一时期的通俗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1935年达1225所。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的阐述言简意赅：近代图书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宗旨是对文献藏用并重，而以用为主；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一整套科学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出版物日益剧增，促进图书馆进行分工协作，加强馆际交流，推广了馆际互借、参考咨询工作和开架制度，积极应用缩微复制技术、静电复印技术、声像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并促使修订图书馆法，实施文献工作标准化，强化图书馆员的培训和教育，进行图书馆资源共享。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长驱直入，现代图书馆已由单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系统，发展到以传递文献信息为主的、全面开放的信息系统。

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网络系统、高密度存贮技术和数据通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图书馆的工作图景。

20世纪末，现代化图书馆的新建，出现了新的图书馆管理方式，已从“物流—人流”的管理到“物流—人流—信息流”的管理，从“书本位”管理到“人本位”管理，从单一指标管理到科学指标体系管理，从“精确”的时空边界管理到“模糊”的时空边界管理，从传统型图书馆管理到“数字化”图书馆的管理。

以科学指标体系为例，探索了先进图书馆的“科学”原则、“优势”原则、“可比”原则、“操作”原则和“动态”原则等科学指标分解的基本原则，积极设置资源配置、“软”“硬”水准、功能集成、对外拓展、学术研究、科学发展、可持续推进等综合的科学指标体系，以科学指标体系规范、协调和促进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出现了绚丽多采的时空组合。

在《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一书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见到相伴延续的20世纪图书馆发展轨迹与文化名人履痕，能够尽情领略向图书馆倾注深情的名人们的文化风采。

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的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

在世界各国旅行中，他喜爱参观图书馆，时刻不能忘怀的是故国的藏书楼。

以他的《丹墨游记》为证：“澹如楼者，吾先中丞公(名国器，曾为广西巡抚)所筑，环二塘二堤，依松台而临榕径，四面人家相映，藏书数万卷于是。

吾少年自十四岁至三十岁读书于是，晨雨夕月，徒倚徘徊者久之。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他从澹如楼里搬出一帙一帙的书，在百年古桧下，或坐或卧，放声朗读，吟诵其间，陶醉其中。年纪稍长，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他泛读了数万卷藏书，还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地球图和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译书，视野拓展，学贯中西。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缪荃孙曾任国史馆纂修、民国清史馆总纂，一手创建我国近代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

缪荃孙是遐迩闻名的藏书家，一是购自私家藏书，二是购自书肆，三是友人相赠，四址相互传抄。在他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刻本，其中宋刻本45种、元刻本58种、明刻本498种。其次为旧抄本，共331种，《明太祖皇帝实录》、《穆宗皇帝实录》为明抄蓝格本，《册府元龟》为明绵纸蓝格抄本。

再次为名人批校本，共135种，还有多出清代名家之手的手稿37种、日本刻本29种、韩国刻本2种，凡此种种都标志了缪氏藏书的高品位。

缪氏赞赏明末清初曹溶的“古书流通”主张及流通古书法——藏书家之间相互传抄以通有无、出资刻印以广流传，为此加紧编订自己藏书目录公诸于世，以利传抄，同时积极参与刻书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可以说是成绩卓然。

国学大师王国维编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原据《英国大百科全书》第9版《图书馆》，此文编译后即于1910年连载于《学部官报》，其原稿后在整理教育部档案中发现，又发表于1935年《图书馆学季刊》第9卷第3、4期上，这是西学东渐介绍西方图书馆史的第一篇系统之作。

梁启超亦倾心于图书馆，早在1896年7月，在由他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就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

书籍馆即图书馆。

他在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对历代国学的整理、考订以及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等，都一一传为佳话。

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家，而且是图书馆学者，他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

1903年，张元济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便开始筹建编译所资料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

他的目光向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延伸。

1909年，资料室改名为涵芬楼。

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馆庆之际，由张元济提倡把新建楼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是东方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张元济和同僚的努力下，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上一世纪30年代初，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150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珍本多卷、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

1927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翌年开办了图书馆讲习所，1930年增设儿童图书馆，以后他又倡议设立流动图书馆，携带大批图书赴浙江、江苏各县、镇，供公共机关陈列、借资展览，并随地调查社会教育状况，为中国图书馆进一步面向社会开辟了通途。

张元济和叶景葵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请来顾廷龙主持馆务，自然留驻图书馆发展史。

鲁迅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对北平市的图书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达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

北京图书馆至今还保留许多鲁迅参与北图建设的珍贵文献。

鲁迅曾据理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

鲁迅还向许多图书馆赠送自己的著作和各种图书。

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故乡绍兴的剡中国书馆等，都受到他的馈赠。

1928年夏，鲁迅携许广平到杭州旅行。

不知情者以为他去度蜜月，而实际上他一连七天都泡在浙江图书馆，为的是研究该馆收藏的《四库全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书》。

王云五的学术生涯与图书馆紧密相连。

他三年读完36巨册大英百科全书。

他周游欧美时，除了考察出版业，还到各地图书馆读书。

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十天时间，一口气读了900余种有关管理的书刊。

他一生中创立了两大私立图书馆，并公开对民众开放。

它们就是于1926年开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和于1974年在台北落成启用的云五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虽属私立图书馆，但财产仍属商务印书馆，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是后者。

王云五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图书分类编目工作领域的重大改革，使得由他所主持的东方图书馆在当时堪称为一所管理完善的图书馆。

王云五在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长时间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他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人手，以充实图书馆的丛书收藏。

自1922年到1927年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方便了图书馆的系统采购。

他从东方图书馆的各科优良图书中精挑细选，并经过科学整理，再大量出版、发行，分期供给各类图书馆，免除了有些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

由于大量出版发行，一版再版，成本降低，售价低廉，十分有利于图书馆购藏。

王云五在历年出版的各种丛书的基础上，存精去芜，出版了“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选定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以及世界名著、参考著作，共收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11500万字。

因“万有文库”包蕴古今中外，百科俱全，预约数竟达8000部。

由于这套丛书的推广，全国各地图书馆纷纷成立。

据统计，依凭这套丛书而成立的图书馆达2000所以上。

据当时在上海通志馆工作的胡道静说：自从“万有文库”出版后，每个中学都很容易地成立一个图书馆。

……我们只要留心图书馆的创立和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中有文化名人的智慧和心血；我们只要关注文化名人的文化行踪和思想轨迹，就不难认识其中有图书馆的铺垫和激励。

20世纪图书馆的发展印迹和文化名人的延伸履痕在时空上高度吻合，在探索“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名义下，竟有那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收获的喜悦！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编辑推荐

本书介绍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与图书馆的交往以及他们的文化成就与图书馆的关系，本书资料详实，描述通俗，记录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读者可以利用本书的正文链接和余思，积极参与图书馆的有奖读书活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